

## 宣教实践

---

### 浅谈唐朝景教来华之因由及没落

温以诺、周新生

#### 前言

本文撰写目的在浅谈唐朝景教来华之因由及 150 年宣教后的没落。

本文组织，先是分析景教来华四个因素：经济、政治与文化。继而指出景教没落的五项因素：(一)唐代废佛毁释的经济原因；(二)政治文化的因素；(三)宗教方面与佛教、道教、儒家太多耦合，无法传纯正的道；(四)传教族群的局限性；(五)教派纷争与内部腐化。最后的总结：没有落实本土化、生根发展、景教与天主教之间纷争、内部腐化等衰败的原因。

#### 景教东传来华的过程

据景教碑文记载：贞观九年，有大秦国（波斯）大德（主教）阿罗本来到京都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太宗遣宰相房玄龄到西郊迎接，一直迎入宫内。贞观十二年，皇帝下诏，称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乃以国费在义

甯坊建大秦寺，置僧 21 人。此为文献所载景教流行中国之始。

- “635 年（唐贞观九年）该派传教士终于到达中国京城长安，其教被称作“景教”。

在 635 年之前，阿罗本就可能已在长安以西的中国边陲地区传教，且很有影响，乃有人报告朝廷。故太宗隆重接待之。至景教碑建立之时（781 年），景教已经历了 140 多的流播和发展，进入黄金时期。一时有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之盛。

圣历年（698—699）与先天末（712），景教曾与佛道二教展开斗争，景教显然处于守势，因有僧首罗含与大德及烈“共振玄纲，具维绝纽。”

玄宗尝命其五个兄弟到教堂行礼。彼时且有僧佶和来朝，“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行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做礼拜）。

天宝初年，命大将军高力士将太宗、高宗、睿宗、中宗、玄宗、五宗的写真画像，送到教堂内安置。

一些景教士且获得封号，赐紫袈裟；还有“赐天香、颁御饌”的荣宠；一些教堂的匾额，也出自御题，即“天题寺榜、额载龙书”。建碑以后，景教又经历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几朝皇帝，教务顺利，但亦平淡，无大发展。<sup>1</sup>

<sup>1</sup>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40-52 頁。

## 景教东传中国的原因

### 景教东传中国的经济原因

#### 中国与波斯的陆路交通

景教传入中国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经济的原因;因为当时中国与波斯之间已经开辟了交通路线,外交使节,商旅,传教士,可以透过交通路线往返。当时以陆上交通为主,比海上交通更早,且陆路交通成为当时政治与经贸的必经之路。

#### 丝绢与宝石、香料的交易

当时的国际贸易,无疑是以丝绢为主要商品,中西交通是以经济为主要背景,为此经贸的利益,才需要政治与军事的力量维系经济命脉。丝绢长时期是中国与西域各国货物交换的媒介,举凡今日东方学者,以中国生丝输入西域,所经之路称为“丝路”。中国可以交换印度,波斯,罗马那些物品呢?琉璃,刺绣,毛毯,药材,香料,香木,沿途购买的宝石。宝石与香料是当时最重要的货物。

#### 国际贸易都市

景教徒自叙利亚,波斯,随西域商旅来到中国;一路上,景教徒在聚集之处建立教堂,这些地方或驻有主教,成为景教的据点,因着经济活动而建立起来的交通网路,也成为当时中国国际贸易都市兴起,景教徒即是透过这样的交通网路与商业活动,传福音进入中国。

#### 景教徒的经济活动

景教徒从事经济活动,有其生活所需,他们也受当时政治与宗教的迫害,例如

受波斯政治迫害而逐渐东来;受伊斯兰教的迫害,成为伊斯兰贵族的侍从。然而他们依照初代基督徒的习惯,“初期基督教时代,大概还是极小规模的组织团体,他们也任命主教或长老,但当时的主教或长老,好像只是巡回牧师似的,从此方移往彼方传布福音,只要可能也和俗人一样生活,他们大半和《使徒行传》中所见保罗事迹一样,不是经商的人,则或为木工,或为锻冶,或为机织,从萝手工业以谋自己生活。这虽是后话,但他们如此布教方法,竟激起僧权主义者的不平之声,责备他们原来就是商人,却动不动舍却自己天职,而假装做僧侣、长老,所以要反对了。”<sup>2</sup> 商业活动是景教徒的特点,他们喜爱买卖,旅行各地是否景教徒是因经济活动而传教至中国,是经济活动为主导?还是有全职的传道人像保罗一样,沿商业活动城市建立教会,旅行至中国,也在中国建立教会?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商业宣教模式.

## 景教东传中国的政治原因

### 中国与波斯的国际关系

波斯受伊斯兰教的压迫约在公元 635-641 年,而唐贞观 9 年是公元 635 年,景教碑中之阿罗本来中国,正是贞观 9 年。那时波斯正在危急存亡之秋,而波斯介于欧洲与中国之间,波斯与中国有商业往来,在政治上也有来往,阿罗本是否兼具官方代表来中国,值得探讨。”自(玄宗)开元十年(722) 至天宝六载 (747) 凡十

---

<sup>2</sup>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 初版 P62

遣使来朝，并献方物。“正因为唐代帝王对于波斯有外交之亲善关系，所以波斯人多来唐避难，从唐太宗、高宗、中宗、玄宗以至德宗，波斯人在唐任显官者不少。

### **罗含即波斯人阿罗罕僧首**

即就景教徒言，在景教碑文中有官衔者即有二人，如伊斯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殿中监，僧业利则为试太常卿。<sup>3</sup>在唐高宗时(公元 656-660 年)，担任唐朝“拂林国诸蕃招慰大使”阿罗罕(Abraham)，与碑文中“僧首罗含”实为同一人。阿罗罕也成为景教的宣教士之一且为其首。从这些资讯，我们可以了解景教徒与官府的关系密切。因为这层关系，在当时唐代，似乎没有在官府的遮盖之下，在各地很难在没有官方允许之下建立教堂与传教。

### **商人与传教师**

来中国朝贡的商人与使节已经媒合，有官方的记载如下：〈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开元二十年(732)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册府元龟〉卷九十五记：“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授首领为果毅，赐僧紫袈裟一副，及帛五十匹，放还蕃。”他们有可能是商人，为了方便，冒充为使节进贡，这样方便进出来回。是否商人真的混在真正的使节当中，是否有景教徒，因通商与政治因素，开了方便之门，他们就借此机会在唐朝建立教堂，发展教务，也许他们的福音宣教策略跟商业与政治紧紧相连。

---

<sup>3</sup>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 初版 P64

唐朝也实行隋朝的政策,就是统治宗教,维护政权。当时佛教是外来宗教,利用宗教来维护政府的统治阶级利益,因此利用宗教,就大肆提倡佛教。当时外来宗教者众,如祆教,摩尼教,包含了景教,景教虽是较小的,势力不大,但亦受到唐朝欢迎,教势发展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根据景教碑文所载,“贞观十二年秋七月,诏曰: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甯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sup>4</sup> 这是在长安奉旨建立的第一所景教堂,指标性的教堂,称大秦寺,里面的教士达 21 人。

### **唐代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

当时唐朝三百余州分为十道,碑文上记载:“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可见景教已经建教堂于唐朝各地。寺满百城,告诉我们景教的广传已遍满各大城。唐玄宗时,令其兄弟等五王,亲临教堂,重建祭坛,重新装潢。天宝初年,令大将军高力士送先朝五帝画像,安置于教堂之内,且亲提匾额。唐肃宗时于灵武等五郡重新建立教堂。当时郭子仪每年集合四间教堂的传道人或称教徒,一起恭敬庆祝五旬节。这是政府支持的基督教宗教节庆。

“7 世纪,聂斯脱里派的传教活动已遍及中亚,并进一步向东推展。635 年(唐贞观九年)该派传教士终于到达中国京城长安,其教被称作“景教”。据景教碑文记载:贞观九年,有大秦国(波斯)大德(主教)阿罗本来到京都长

---

<sup>4</sup>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 初版 P68

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太宗遣宰相房玄龄到西郊迎接，一直迎入宫内。贞观十二年，皇帝下诏，称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乃以国费在义甯坊建大秦寺，置僧 21 人。此为文献所载景教流行中国之始。由此可以推测：在 635 年之前，阿罗本就可能已在长安以西的中国边陲地区传教，且很有影响，乃有人报告朝廷。故太宗隆重接待之。景教由此得到唐朝之承认和容纳，可以奉旨公开推展教务。<sup>5</sup>

景教徒与政府的关系发展的如此密切,是否是政治利用宗教,掌控宗教,借此掌握民心,稳固政权。景教领袖们是否真正将福音传入政府的各阶层,深入社会民心,这样的宣教策略,我们只看到被框架起来的骨架,缺少福音性的活动在社会基层老百姓,也未闻历史记载有广大人群接受福音,一但被政府框架起来的骨架倒了,整个教堂在各地的宣教工作也即刻受到了限制与亏损。主导权受限于政府.这是宣教策略中的致命伤之一。

## 景教东传中国的文化原因

### **景教徒的高度技术生活**

当时希腊文化比较文明,景教徒活动于叙利亚一带,承袭了希腊文化所带来的高度技术生活,因此当景教徒在中亚一带传教与活动的时候,风声早已传入唐朝皇帝的耳中。在 635 年之前,阿罗本就可能已在长安以西的中国边陲地区传教,

---

<sup>5</sup> 1840 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28

且很有影响，乃有人报告朝廷。故太宗隆重迎接并接待之。

当时景教徒的医术在中亚一带颇负盛名，他们也翻译希腊文，叙利亚文的书为阿拉伯文，元朝初期蒙古是没有文字的，元世祖时蒙古仿维吾尔文，而维吾尔文是仿叙利亚文；清太宗时，又仿蒙古文创造满州文。景教徒传教士们在东方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景教徒成为叙利亚文与中亚，土耳其，蒙古之间的语言翻译与创作的桥梁已是不可埋没的事实与贡献。

### **大德及烈之“广造奇器异巧”的作用**

“在景教徒随使节到达长安之时，他们常常以贵重的舶来品献给朝廷，或由来中国游历的波斯商人提供多额之运动资金，正是投合中国统治阶级爱好奇巧珍玩之心理的。例如在唐则天武后的圣历年间(西元 698-699)景教受了佛教压迫，在先天年末(713 年)，又受道教排斥，在此中国景教会正在危机之时，中国景教征得到了波斯本国景教会的助力，使垂危之景教复显而流行如故。这期间的消息，见于景教碑文的是：“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 “这里“用壮”“腾口”二义见周易，“下士大笑”见《老子》。

盖言在圣历年间，释徒依众恃强，肆口谩骂于东周，东周指东都洛阳；又在先天末年，无知小儒随声讪谤于西镐，西镐指西部长安。而即在此际，从景教之总本山，奉法主之命来长安者，即：‘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具维绝纽。 “这大德及烈即开元二十年波斯遣使



朝贡之大德憎及烈。他和僧首罗含二人皆以西方（金方）贵胄（贵绪）脱俗高僧的资格来唐，来唐以后使景教会断而复续，竟振兴起来了。这期间秘密，可参考《新唐书》和《册府元龟》。《新唐书》卷百十二柳泽传，载玄宗开元中(713—741)“有市舶使周庆立者，呈献奇器为柳泽所劾”。《册府，元龟》卷五百四十六详载其事：柳泽开元二年(714年)为殿中侍御史、岭南监造使，会市舶使有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sup>6</sup>这奇器异巧以进就是稀世珍品上贡于朝廷，得以化解其他宗教的压迫排挤。

当景教徒随使节到达长安时，他们常以贵重的舶来品献给皇帝，或者由波斯商人所提供的大量资金，这很符合当时皇帝的喜好，尤其是来自中亚一带的科技文明，奇玩与贵重的稀世珍品对当时的中国皇帝而言，兴趣当然很大。

景教徒所献的珍品，能让中国的皇帝，龙心大悦。即便在景教碑中有出现佛教的压迫，道教的排斥，景教都能化险为夷。特使也是景教徒的大德及烈后来得到朝廷的恩宠，给景教恢复名誉。

景教徒献稀世珍品给朝廷，与明朝天主教徒利玛窦献的时钟给朝廷有相同的意思。是否致赠礼物的方式博取官位与开方便传道之门，值得可取？或许是当时的环境使然。同时这也是景教徒的文化优势，所开创出来的一条路。

### 耶稣会士与景教传教方法雷同

景教徒在不同文化的传教工作，也有不同的本色化努力，力求与当地文化的妥

---

<sup>6</sup>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70-71

协,避免冲突。例如在波斯面对拜火教(祆教),因祆教反对独身主义,因此景教徒也带妻子一同传道。在中国的时候,在崇拜的仪式中,将叙利亚文改为中文,“如敦煌发现的《景教三威蒙度赞》即为好例。还有如中国景教徒之祖先崇拜及为死者求冥福,此皆投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心理,习惯,在这一点景教徒和明未来华的耶稣会士,毕竟相同,而且实为他们机会主义的传教方法的先驱者了。”<sup>7</sup>

景教徒在中国的宣教策略的失败之一,跟本色化太超过有绝对的关系。圣经中没有为死人祈福祷告这方面的教导,宣教为了本色化而为之,已经跟圣经的教训相违背。基督教信仰有其独特性,绝对性的真理是不能因为本色化而有所妥协的。宣教士可以在穿着,饮食,语言,生活方面与文化认同,但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理,童贞女生子,不可拜偶像,不可向死人祈福,都是不能妥协的真理。真理若失去了独一性,如何在佛道教的夹击中显出真理的光,当福音不再单纯是十字架的福音,教会怎能在神的恩典与同在中成长茁壮。

## 景教在唐元宣教衰微之原因

### 唐代废佛毁释的经济原因

公元 845 年,即唐会昌 5 年,发生废佛事件,景教受其波及,是衰微的起点,当时景教,祆教,与佛教,都被当作外来宗教,并且看待景教与佛教是类似的宗教,因此受到政府打压,景教徒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令其还俗,本国人回归成为纳税人

<sup>7</sup> 1840 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72

口,外国人则遣返回国。政府打压宗教的理由当然不是经济因素,他们的理由是说这些僧尼耗尽天下,欲去之。

至于废佛的原因,理由是增进全国的经济。“据《新唐书》卷五十二《食货志》四十二:“武宗即位,废浮图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大秦、穆护、袄二千余人,上都、东都每街留寺二,每寺僧三十人,诸道留僧以三等,不过二十人。腴田鬻钱送户部,中下田,给等家奴婢,丁壮者为两税户,人十亩”。当时拆毁寺院就有四千六百所,还俗之寺僧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这些人与田产,对当时的经济自然产生助益。当宗教势力扩增,产业庞大,影响到皇权时,自然引起朝廷的觊觎,这块肥肉是在皇帝的嘴里还是在僧人口里?

当时政治权大于宗教权的唐朝,为了给宗教一个教训,自然称其蛊惑民心。收刮教产,是其背后的目的。朝廷对宗教是政策目的高于宗教信仰;唐武宗时,唐室国力今非昔比,武宗见天下僧尼丰衣足食,教产庞大,心里自然不是滋味,因此并非宗教问题乃是经济问题,大规模的废佛行动。

景教徒与教堂所受到的牵连与损失,没有正确的数据可以参考。教堂被拆毁,景教碑之淹没,即为意料中事。当时西域已沦吐蕃掌握,东西往来也不如唐初盛世时之便,此时的丝路多为不便于交通,外国来的景教徒若被遣返,将会死于返国之路途。也因此景教受到了非常严酷的打击。

唐武宗废佛隔年即病故,唐宣宗(公元 847-859 年)即位,他便收回先帝的废佛

的命令,重建寺院,想必春风吹又生的景教徒必乘此时机,力图恢复教势.是否有迹象显示景教徒仍存在中国?

“唐僖宗干符五年(公元 878 年),黄巢起义时,死守广东城而战死的人间,有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其中即有景教徒,”可见废佛事件并未让景教徒完全消失。

### 政治文化的因素

- a.唐武宗时,当时西域的交通已堵塞,景教徒与叙利亚的教会失去联系,没有使徒性的来往拜访坚固,也没有母会的支援与帮助,渐渐属灵上失去信仰上的力量。
- b.因武宗废佛,景教徒得不到朝廷的保护,以致受牵连,造成莫大的损失。没有政府的支持,在当时环境是很难生存。
- c.当时佛教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有五千零四十八部,而景教的五百三十部,相形之下,在文化的影响层面与深根民间信仰,显然落后于佛教。“相形之下,传入中国唐代之佛典既有五千四十八部,而大秦本教经则不过五百三十部,正如唐舒元與《重岩寺碑》所云“天下三夷寺,不及释氏一邑。佛教因得中国的保护,所以在武宗废佛毁释之后,旋即恢复,而景教则在中国文化的重大压力之下始终不能抬起头来。”<sup>8</sup>

---

<sup>8</sup> 中國景教 朱謙之著. 東方出版社 1993.5 初版 P209

d.“在政教关系及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中，景教完全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普遍王权之下。碑文大赞唐朝历代皇帝，更言“道非圣不弘，圣非道不大，道圣符契，天下文明。”明末耶稣会士阳玛诺《碑颂正诂》解释说：这是“言国主助圣教广，圣教助国主之光，盖圣教流行之益，缘帝王从奉；居高作倡，大道广敷，教法相资，而皇猷熙奏也”。可见，景教传教士认识到在专制帝国，宗教绝无在圣王之外谋求独立发展之可能，乃自觉附隶属于专制统治机器，以求自身之发展。他们还大倡忠君、孝道思想，以尊君事父相号召。

景教可以说全面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及正统意识形态相妥协。<sup>9</sup>景教妥协于政治王权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当时的专制王权之下,所有宗教都是统一管理无一例外,景教徒想不顺服,也无他法可行。因此,当与政权完全的挂勾之下,政权倾倒,教务就跟着倾倒。佛教能在中国生根与文化融合,这是他生存之道,也许正是景教过分倚赖政权的相反结果。

景教对政治的过分依赖带来了双重的效应，首先，因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即上层官员，故在下层社会或民众（由其是汉人）中没有基础，影响甚微；其次，对政治、政权的过分依赖意味着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委托给它，政兴则教兴，政亡则教亡。与此同时，宗教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庄严形象亦因此受到损害。

---

<sup>9</sup> :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34-35

“宗教虽不能与政治无关，然关系过密，必将随国家政策而转移。…… 胥当时景教以为荣宠者，而不知宗教之庄严已因是失坠。……

景教之随唐宋易代而销声匿迹，其主要原因，即由于其附政治也。

但对于以上结论，笔者却颇有疑问：在中国，古代基督宗教与政权处于什么样的政教关系之中才是合宜的，即处于既不过密亦不过疏之中道？为什么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曾有过依附政治的时期，却仍能持续发展？为什么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谋求独立发展的时期，但却又因此走向衰落？这些设问意在说明：不能停留在笼统的政教关系结论上，还必须说明政教关系中“政”的性质与结构。

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虽然在各朝略有因革损益，因而有所差别，但就其结构而言，则有一普遍特征，即：一方面它缺乏从人格神那里追求其统治正当性、合法性的检验来源这样一个维度，另一方面它又追求臣民思想高度统一。前者使得崇奉人格神的宗教,在本质上成为政治统治不太需要的东西（虽然有时也有君权神授的说法和做法），后者则使得一切文化形态（包括宗教）都必须臣服于主流的正统意识形态。

这使得外来宗教在中国面临着一种两难困境：如果过分依附于主流政治文化传统以及代表着这种政治文化传统的政权；那么，它也就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了在时间长河中变动不居的俗物，随之升降沉浮。如果谋求独立之发展，它不仅会丧失掉最强大、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保护伞，而且会因

走向民间而被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士大夫）目为妖术，民间宗教的命运大抵如此。<sup>10</sup>

### 信仰及本色化的因素<sup>11</sup>

景教宣教策略的失败，其中一个问题是信仰及本色化的问题，景教在信仰方面走溶融妥协的路线。但未能培养翻译人才及信徒学者，永远无法改变附会在佛教框架之下，又未能使基督教信仰，先落实于中国文化的土壤，继而开花结果的繁植下去。过度的本色化牺牲了基督信仰的立场。圣经中没有为死人祈福祷告这方面的教导，宣教为了本色化而为之，已经跟圣经的教训相违背。基督教信仰有其独特性，绝对性的真理是不能因为本色化而有所妥协的。宣教士可以在穿着，饮食，语言，生活方面与文化认同，但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理，童贞女生子，不可拜偶像，不可向死人祈福，都是不能妥协的真理。真理若失去了独一性，如何在佛道教的夹击中显出真理的光？当福音不再单纯是十字架的福音，教会怎能在神的恩典与同在中成长茁壮？

景教与佛教，道教，儒家太多耦合，无法传纯正的道。景教在中国与佛老之术

<sup>10</sup>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42-43

<sup>11</sup> 參閱下列中、英文資料:

- Gareth Hughes, "Why did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hina disappear?" November 16, 2016 Orient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Oxford @ users.ox.ac.uk/~wolf2305/documents/china.pdf (retrieved June 1, 2019)
- 孙景尧, "成在此, 败在此: 解读唐代景教文献的启示 -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2003) @ [qktg.shnu.edu.cn/skb/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http://qktg.shnu.edu.cn/skb/ch/reader/create_pdf.aspx?file...)
- 聶志軍, "唐代景教的本土化策略——以词语释义为例" (2010) @ <https://wenku.baidu.com/view/425a87926529647d2728526c.html?sxts=1561848297750> (accessed June 1, 2019)
-

语、思想相牵合，更在教理中融入儒家的忠孝观念及祖先崇拜。如：“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完全是仿《道德经》中“道常无名”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名之曰大”的表述方式。碑文中还引用了贞观十二年秋七月诏文（略），从中可见有唐历代君主所以欢迎景教，正是因为他们认为景教教义与老子五千言相合。碑文又曰：“宗周德丧，青驾西升。巨唐道光，景风东扇”，这分明是影射周末老子乘青牛西入流沙的传说，喻景教东来，是再兴老子之教。说明景教为了扩张其势力，求得并存与发展，附会了道家道教思想和教义。在修养方法方面也有类似的例子。

景教也附会佛教，景教碑、《三威蒙度赞》屡屡援用佛家术语：妙有、慈航、世尊、僧、大德、法三、慈恩、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救度，乃至以佛称天主，景教徒（叙利亚来的传教士、神职人员）悉以僧自称，以贝叶梵音称景教经典。景净（碑文作者）还曾参加佛典的翻译工作。

当人民以为景教是外来佛教的一支，翻译景教经典大量使用佛教用语，翻译工作也是由朝廷官办主导，翻译者同是具有官方身分也同时是翻译佛经之人，把先知使徒称为法王，把传教士称为僧，怎么看都不像是基督教。一旦政治上经历废佛事件，难保景教徒不受摧毁。

当基督教的信仰不能单纯的传讲圣经真理，不能传创造性的独一无二真神，反而参杂了其他宗教色彩与思想，这样的福音很难永世留存，在景教这个名称上就直接受了影响：“自从天启年间发现景教碑后，世人对景教之名多有解释。明末的中国



天主教徒李之藻尝撰《读景教碑书后》，其言曰：“景者大也，火照也，光明也。”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阳玛诺则说：“景者，光明广大之义”，教者，教会也，言信仰景道之人缔结之团体。”景教是非基督教徒所取的名称，虽不满意，却只好接受，这也说明当时景教徒对翻译经典的无奈与无助。既然如此，教会怎么能长远发展而历久不衰呢？

“虽然汉语景教文献几乎较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教义，但由于景教在唐朝采取了附会佛道的传教策略，而且走得过远，又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汉语神学语言，以至它在唐朝传播 200 多年后，各种唐代史书都以之为佛教的一支，五代和宋朝则没有任何关于景教的记载。这说明，就传播方而言，唐朝的景教实际上没有彰显基督宗教作为世界性大宗教的真实面目。”研读这些关于景教的资料，其实景教的宣教策略并不是自发性的愿意附会在佛教里面来发展，是专制政权之下的统一管理，也许佛教先于景教来中国发展，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以至于景教，祆教，都是附会在佛教里发展，就朝廷而言，他们看的不是宗教内涵上的差异性，他们看的是都是外来可掌控的宗教，对朝廷政权经济有益，他们就统一管理利用之。

景教徒令人惋惜之处，是没有培养属于自己的翻译人才，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他们有足够时间可以使用官方语言，用符合圣经的神学词句来翻译经典，虽然翻译权仍在朝廷手中，但是不努力培养翻译人才，永远无法改变附会在佛教框架之下的事实。况且景教并未与中国社会、文化产生实质性的对话、冲撞，没有对

中国文化、社会构成正面或负面的刺激。除了景教碑之外,很少社会层面的历史文献记录提供我们参考,让我们知道景教在本色化方面的努力有哪些。

### 传教族群的局限性

“唐元两代的基督宗教有一引人注目的特点,即:他们传播的物件 和皈依的信徒,要么是皇室成员和名公巨卿,要么是汉人之外的少数民族和外国人。唐朝时,景教传播物件主要限于皇室、名公巨卿以及从西域来到大唐的商人和使臣,关于汉人信奉景教的记载似乎很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虽然罗列、颂扬了很多皇帝,但实际上诸位皇帝只是容忍、赞同传播景教,没有一位皇帝真正受洗入教。大唐以其特有的博大的文化心胸和自信,向一切外来文化敞开大门。摩尼教、景教等外来宗教(包括佛教)由于得以各行其道,流播发展。元朝以武力入主中原,土广民众,加上其宗教传统本来就是多神的,故对各种宗教兼收并蓄,来者不拒,景教、天主教、佛教、回教都可以传播。这方面也颇与唐朝相似。但是,元代景教的传播物件非常有限:只在蒙古人和色目人中流行,似乎没有向汉人和南人渗透的尝试。这样,当汉人的政权明帝国取代入主中原的蒙元帝国时,附丽于蒙古人政权的景教(包括天主教)竟被当作蒙古人政权中的一种建置(Institution)被废置。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这是很易理解的一种文化逻辑。至论元朝之天主教,其传播物件也限于蒙古人、色目人和边缘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很少有关于汉人信奉天主教的记载。因此,莫尔

在《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写道：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信徒的故事，并不是天主教的教会在中国开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义上是，或在实际上是信奉耶稣的外国人在中国久居，或是暂居的记载。

此论可论诸当时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出使蒙古后，留下的各种关于中国各地基督徒及其宗教生活的记载，材料甚多，兹不赘述。

元代的基督教不仅没有向汉人渗透，甚至还因攀附蒙人政权而陷入了与汉民族的深刻矛盾之中。蒙古人当时将汉族置于贱类，乃至使儒生“十儒九丐”。而在汉人心目中，蒙古人是以“夷狄”入主中原的。蒙古人对汉人推行苛政，而对外来的传教士则给予多方优待。传教士除获得皇帝颁赐的俸金（很优厚）外，还拥有以下特权：“也里可温（景教天主教）军籍之停止”（不服兵役）；“徭役之蠲除”；“租税之征免”。近人陈垣对当时也里可温租税之征免还作过以下叙述：“元代对于诸教租税之征免，至少一定。大抵太祖、太宗时，无论何人，均须纳税；至定宗、宪宗之间，则诸教士之田税、商税均行豁免。……也里可温之教徒……身虽奉教，而其人为农、为工、为商、为仕如故，未尝因奉教而必须脱离其职业，故其教徒比他教为盛。豁免租税，于国家收入，影响至大”。如此损失的税收大概只能转移到汉人头上，从而可能激化了汉蒙之间的对立及汉人对外来宗教的憎恶。

萧若瑟在《天主教传行中国》一书中，对元代基督教衰灭的原因作了以下分析总结：其故有二：一，元时北平各处，外籍客民最多，西域各部落人，与

元之皇家同种，更不知凡几。凡此诸人，弥漫于官商兵各界。以理度之，当时奉基督教者，此类客籍人居多。而土着之华人，实居最少数，是以元祚既覆，若辈亦各回本籍，或随元主北迁，此一故也。二、蒙古以鞑靼入主中国，恒为国人所切齿。一旦失势，洪武君臣，即乘机力行其排外主义。凡蒙古所建设，如上都宫阙之类，悉数削平；而于其保护之教徒、教士、教堂，则更无所顾惜，北平之三教堂，早已毁灭无踪矣。此又一故也。<sup>12</sup>

景教徒在唐朝的时代多为商人与传教士混合一起行动的宣教队伍,当他们历经千山万水的远道东方中原,他们所面临的不是一块柔弱的土地,乃是国势正强盛的大唐盛世,在语言与文化的适应上尚且艰辛,又面临已存在多年的佛道教势力夹击,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完全顺服朝廷的安排,在朝廷的保护伞之下,他们可以为官,经商,建立教堂.也许他们有自身的利益或朝廷自有宗教政策,他们连圣经翻译与在哪些城市盖教堂都需要政府的协助。因此他们就围绕在政府官员,公卿达贵之间,还有接待远道而来的商旅之间传福音。

景教徒宣教策略的失败点之一,是眼光只专注政府高层与达官显贵和同样是外国来的商旅传福音。如果说是唐朝的宗教政策与管控使他们受限于某些城市教堂,这也不尽然,因为大秦寺不下百间,如果佛教,道教可以深入民间,何以景教徒不行呢?既然已建立大秦寺,何不以教堂为中心向周遭城市居民宣教?显然传教士

---

<sup>12</sup> 1840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  
[比利時] 著 P43-44

语言问题与信仰本色化问题没有落实,景教在中国约 150-200 年,对中华文化没有产生融合与深入人心,没有建立本土的传教士人才培育,让教义与文化对话,产生文化的刺激与共鸣,让更多华人成为教会领袖,华人带领华人,一代传承一代。

唐武宗的废佛行动.虽重重的打击了佛教,道教,景教,祆教。但是隔年唐宣宗(公元 847-859 年)即位,他便收回先帝的废佛的命令,重建寺院,佛教道教恢复元气,何以景教重伤不起?原本打击的是佛教,结果受牵连的景教反而难以恢复荣景。

这就是宣教策略只重视朝廷与达官显贵与外来商旅,没有与民众产生认同与文化的共鸣。当失去信仰生活本色化或与民众生活价值观的连结,教堂存在与否,民众是不会有感觉的。因为信仰的本质不在教堂的建筑物乃在信徒的信心与生命。

### 教派纷争与内部腐化

“教派纷争一指古代基督宗教与流行中国的其他几大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纷争，二指基督宗教内部的景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纷争。兹先述前者：景教碑文作者景净是叙利亚人，据佛教文献《贞元新定释教目录》所载，他与当时的佛教僧侣关系很密切。但据他的碑文所载，最初对景教发起攻击的正是佛僧。碑文曰：“圣历年（武则天年号 699-700）释子用壮（得势而处于极盛）腾口（谩骂）于东周（洛阳）。”稍后，道，儒也对景教发难，“先天（玄宗年号 712-713）末下士（老子《道德经》第四章曰“下士闻道，大笑之”，故下士指道士或道家道教）大笑讪谤于西镐（西安）”，由于僧首罗含和大德及烈

的极力维持，才使景教度过难关。这说明景教在唐朝时便曾遭到本土各大宗教的排斥。景净之向佛教示好，也许是吸取历史教训，不得已而然。

据朱谦之分析，景教还因伊斯兰教的勃兴和压迫而，在铁木耳施政之前就已经济上呈现衰颓之象。铁木耳施政时，因其皈依伊斯兰教，对基督教施以强大的政治压迫，乃至残酷杀戮（1403）。M. L'Abbe Huc 在《基督教在中国》（P421）一书中写道：“铁木耳是冷酷残忍，好象严峻的天谴之鞭一样扫过去了。他是不知怜悯之情的冷酷男子，他荒废了几千都邑，杀戮了无数人民，把亚洲大好部分的住民化为尸山血河，以致遍地为废墟所蔽而成为荒野”，这些地方也就成了基督徒们的埋葬所。以上是就东亚、中亚之景教总体而言，若论元代中国景教之具体情况，有资料证明，在元代景教兴盛时，景教与释道两种本土宗教亦多有相争之事。实际是佛教压制景教。如元仁宗尚佛，乃将镇江金山景教寺寺顶上十字架以及寺内塑像拆毁，重塑佛像，且令也里可温子子孙孙勿争，争者坐罪以重论。景教在扩展教务之时，必会与其他同时流行之宗教产生矛盾。

据《元典章》一道谕文所载：大德间江南诸路道教所讼，谓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乃有也里可温招收民户，将法箓先生诱化。引起强烈反应，乃至讼案。可见道教亦参与了排斥景教之活动。

再看古代基督宗教的内部纷争：在鲁布鲁克时代，景教徒对罗马教廷派来的传教士尚能保持一定的尊敬。当鲁氏进入和林城时，彼时当地的景教徒甚至

都列队于教堂前欢迎他，天主教徒和景教徒同在教堂做弥撒。在蒙哥汗的宫廷里，两派的教士也能和睦共处。基督教一时俨然为一普世宗教。

但是，当蒙高维诺来到汉八里传教时，景教徒却以诬告将他送进了监狱。蒙高维诺在写给欧洲的第二封信中，对此有详细记述这种纷争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不管获胜者为哪一方，双方都会受到损害。获胜者受到损害的是其宗教之庄严，致败者则会大吃眼前亏。内部腐化也是唐元两代的中国基督宗教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往往为道德之象征，一旦因教规松弛而产生内部腐化，则其本身将丧失发展之内部活力。关于唐朝景教徒的生活情形，我们不得而知。元朝景教徒的生活，则多有记载。鲁布鲁克曰：他们（指景教徒）完全堕落了。

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鞑靼人当中，甚至象鞑靼人一样娶好些老婆……他们是重婚者……他们是售卖僧职者，因为他们不免费行圣餐礼。他们为老婆孩子操劳，因而一心发财，不顾信仰。至于诬告，更非教徒所当为。以上皆为天主教传教士之记载，天主教视聂斯托里派为异端，故以上记载或出于攻讦，仅供参考。

综上所述，唐元两代的基督教之衰灭，原因是多方面，最重要的是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政治的性质与结构说明，任何与之发生密切关系的宗教都会：随此种政权之兴衰而升沉浮降，或随着统治者个人之好恶而决定自己的命运，决难产生一种圣俗政教良性互动的二元结构。本土宗教的排斥会使外来宗教难以

获得播种之土壤，教会内部的腐化堕落更会使自身丧失生存发展之内部活力。

这些既是古代

中国基督教衰灭之原因，亦是其所昭示之教训。<sup>13</sup> 景教在唐朝时便曾遭到本土各大宗教的排斥，很可能采取的宣教策略是靠拢朝廷与佛教友好，以至于在教名与翻译经典都在佛教的翻译人员下使用很多佛教辞汇，也可能是佛教势力庞大，不得不在官办的翻译场内，虽不同意只好接受的翻译事实，“耶稣”翻译成“移鼠”，怎么看都觉得不恰当。佛教道教排斥景教可见一斑。

上述景教在元朝时期，与朝廷绑得更紧，且在元朝时期天主教派遣使者来觐见皇帝，并互派使节，景教徒曾与天主教使节和睦相处，但也发生景教徒陷害天主教徒下监之事，以致天主教与景教互为攻击，也许在教义上，因耶稣是否神人二性，耶稣的母亲是否神的母亲或只是人子的母亲有很大的争议，以至于在元朝时期，两者之间互相排斥，从天主教的历史纪录里面，视景教徒为异端，把景教徒说成高利贷者和酒鬼，他们是重婚者……他们是售卖僧职者，因为他们不免费行圣餐礼。他们为老婆孩子操劳，因而一心发财，不顾信仰。至于诬告，更非教徒所当为。这些天主教的历史记载是出于挟怨报复还是真实记载，不得而知。

景教似乎没有像天主教一样有所谓的教廷官方代表，以致在官方的发言权上，失去先机，即便在历史上景教徒比天主教早到 700 年，但在中国的土地上，景教的影响力似乎没有后来的天主教更有组织与强势。在后来者的排挤之下，和渐渐被

---

<sup>13</sup> 1840 年前的基督教(北大上課講義:基督教與中國文化) 孫尚揚 鐘鳴旦[比利時] 著 P44-45



天主教所吸收,又因元朝的灭亡,景教徒成为明朝的敌人的朋友,也成为敌人,以致景教徒受到再一次的打击。

## 结论:

### 景教宣教策略失败的一些反思

1. 景教徒看自己与中国人看他们,有一个共通点,都以为是外国人,是外来的宗教,没有落实本土化,生根发展。是很重要的关键因素。
2. 「大部分在中国的景教徒是外国人而非中国人(汉人),反而大部分的信徒多为边疆维吾尔族(Uigur)或蒙古族(Tungus)的雇佣兵....。」

唐朝时,景教传播物件主要限於皇室、名公巨卿以及从西域来到大唐的商人和使臣,关于汉人信奉景教的记载似乎很少。至论元朝之天主教,其传播物件也限於蒙古人、色目人和边缘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很少有关于汉人信奉天主教的记载。没有传播福音给中国本体性汉族是最致命的忽略。

3. 「在中国他们未能培养本地的领导人、平信徒、和神职人员,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所列的 72 个人名中,仅有一个人名可能是汉人的名字。
4. 中国文化及哲学、教育和属灵环境的复杂程度超越外国人所能理解的范围,因此当景教宣教士来到帝王制度的唐朝,自然只能配合与顺从,无法渗入中国文化与社会。
5. 由於与穆斯林的交战,642 年波斯帝国陨歿,景教徒也受到了亏损。

6. 因基督教修道士和佛教僧侣(outlawing)在 845 年的决议，在第九世纪失去波斯帝国的宠爱和支援。
7. 黄巢之乱许多大城市被佔领和人民被杀。包括「景教」所剩下的人大部分也被杀害。景教徒的人数在中原一带几乎灭亡。
8. 基督教一夫一妻制的原则，在一夫多妻制的中国和穆斯林的社会并不受到欢迎。
9. 经常受穆斯林的骚扰，有时也受暴力的迫害。
10. 公元 845 年,即唐会昌 5 年,发生废佛事件,景教受其波及,是衰微的起点。景教徒与教堂所受到的损失,没有正确的数据可以参考.教堂被拆毁,景教碑之淹没,即为意料中事.当时西域已沦吐蕃掌握,东西往来也不如唐初盛世时之便,此时的丝路多为不便於交通,外国来的景教徒若被遣返,且将会死於返国之路途。也因此景教受到了非常严酷的打击。
11. 景教对政治的过分依赖带来了双重的效应，首先，因其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朝廷，即上层官员，故在下层社会或民众（由其是汉人）中没有基础，影响甚微；其次，对政治、政权的过分依赖,意味著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委託给它，政兴则教兴，政亡则教亡。与此同时，宗教的那种超凡脱俗的庄严形象亦因此受到损害。
12. 虽然汉语景教文献几乎较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教义，但由於景教在唐朝采取了附会佛道的传教策略，而且走得过远，又没有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汉语

神学语言，以至它在唐元传播 200 多年后，各种唐代史书都以之为佛教的一支，五代和宋朝则没有任何关于景教的记载。这说明，就传播方而言，唐朝的景教实际上没有彰显基督教作为世界性大宗教的真实影响力。

13. 景教在唐朝的没落，有信仰及本色化方面的因素。景教在真理方面的妥协，构成信仰破产。又因过度本色化(包括滥用佛教语词，混杂佛道思想)，未能保持基督教的本质及特色。既乏翻译人才又未培育信徒学者,以致基督教未能成功地植根中国文化。
14. 教派纷争一指古代基督宗教与流行中国的其他几大宗教如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之间的纷争，二指基督宗教内部的景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纷争。景教在扩展教务之时，必会与其他同时流行之宗教产生矛盾。引起强烈反应，乃至讼案。景教还因伊斯兰教的勃兴和压迫而在元朝铁木耳施政之前就已在经济上呈现衰颓之象。
15. 内部腐化：内部腐化也是唐元两代的中国基督宗教衰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宗教往往为道德之象征，一旦因教规松弛而产生内部腐化，则其本身将丧失发展之内部活力。关于唐朝景教徒的生活情形，我们不得而知。元朝景教徒的生活，则多有记载。鲁布鲁克曰：他们（指景教徒）完全堕落了。首先，他们是高利贷者和酒鬼，有些人住在鞑靼人当中，甚至象鞑靼人一样娶好些老婆..... 他们是重婚者..... 他们是售卖僧职者，因为他们不免费行圣餐礼。他们为老婆孩子操劳，因而一心发财，不顾信仰。至于诬

告，更非教徒所当为。以上皆为天主教传教士之记载，天主教视聂斯托裡派为异端，故以上记载或出於攻訐，仅供参考。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 第 57 期 2019 年 7 月号